

# 谱写遵义新史诗

刘庆邦



口粮，支援红军，更为可歌可泣的，是他们为革命献出了热血和生命。惨烈的湘江血战之后，红军攻克遵义，得到了12天的休整，有时间召开会议。休整和会议期间，在红军的宣传和感召下，遵义的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成功“扩红”五千余人，使红军队伍再次得到壮大。他们刚参军就参加战斗，有人牺牲在随后的青杠坡等战斗中，成了年轻的烈士。

遵义人民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革命胜利后，他们应该过上好日子。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他们一直被贫困所困扰，日子没得到多大好转。而且，遵义地处武陵山、乌蒙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贫困面广，贫困量大，贫困程度深，要全面脱贫谈何容易！判断一个地方是否贫困，除了吃饭、穿衣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是看当地的小伙子是否能找到老婆。遵义贫困山村的姑娘，通过外出打工，纷纷嫁到外地去了。而本地的一些小伙子，只好外出打工，到外地找老婆。他们在外地找到了老婆，老婆怀了孕，他们才把老婆带回老家。老婆生下孩子后，把孩子扔给家中的老人，就一个人跑掉了。“金凤凰”跑掉的原因，是没看到可供栖息的“梧桐树”，是实在不能忍受山村的贫穷和闭塞。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进扶贫开发，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山区困难群众早日脱贫致富。遵义作为革命老区之一，这种贫困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从2014年开始，遵义市、区、县、乡（镇）各级领导，如同当年的红军指战员听到催征的号角，紧急动员起来，迅速全面地打响了一场深入、持久的脱贫攻坚战。他们紧紧抓住脱贫攻坚的牛鼻子，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他们既挂帅，又出征，背起简单的行囊，继承革命的传统，走出机关，走出城市，走出自己的小家庭，一头扎进深山老林里的贫困村。5年多来，全市选派了4475名第一书记、驻村干部奔赴脱贫攻坚战场；市县两级机关单位组织近12万名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脱贫攻坚既像一场阵地战，又像一场持久战，扶贫队员们付出的千辛万苦可想而知。他们付出了汗水，付出了热血，有的人还付出了生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位驻村扶贫干部的经历都可以写一本书。

让人深感欣慰的是，经过5年多的艰苦奋战，2020年3月3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向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遵义全境812万老区人民全部脱贫！遵义市的脱贫是高质量、高标准的，没有落下一个民族，没有落下一个村庄，没有落下一户，没有落下一人。这是遵义人民的脱贫史，奋斗史，创业史，也是继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之后，在遵义这块土地上谱写的新的壮丽史诗。脱贫的消息传开，锣鼓敲起来，鞭炮放起来，龙狮舞起来，遵义人民欢喜若狂，驻村干部喜极而泣。

在遵义期间，我们迎着初夏绿色的暖风，足不停步，连续走访了务川、湄潭、汇川、仁怀、习水、赤水等市、区、县和一些乡镇、山村。

汇川区芝麻镇的竹元村曾是省级一类深度贫困村，全村41个村民组，近5000人，分住在三山夹两沟的原始贫瘠地带，从山顶到沟底，海拔落差1000多米。春来山，山下春暖花开，山上仍寒风逼人。在扶贫第一书记谢佳清2016年驻村之前，村里到处都是破房子，烂猪圈，连一栋像样的房子都没有。房子外面破败，里面更是贫穷。一些小伙子眼看长大成人了，却迟迟找不到老婆，无奈只好远走他乡，到外

面的世界去讨生活。竹元村之所以这样贫穷，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交通问题扼住了竹元村的喉咙。全村没有一条真正的公路，村民出行只能走山林田地之间劳作的羊肠小路，下雨天只能走杂草掩没的泥巴路。竹元村成了一个孤岛，与外面的世界几乎是隔绝的状态。山里生长的桃子、李子 and 蔬菜，因为运不出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烂掉。冬天取暖要烧煤，他们只能把煤装进背篓里，一篓一篓往山上背。或是几户人家共养一匹马，用马匹往山上驮沉重的东西。这种状况正如竹元村的村民在花灯调里唱的那样：“正月里来正月整，遵义有个竹元村；山高坡陡穷得很，走亲访友路难行。”

扶贫键要按准，一定要按到关键的那个键。竹元村的扶贫团队，在经过反复深入调研后做出的脱贫规划中，把修路放在了突出的关键位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全村动员，上下合力，千方百计，充分调动财力、物力、人力和一切积极因素，硬是修成了一条19.8公里的通村公路，12条42.9公里的通村民小组的水泥路，实现了“通组连户都硬化，车子开到院坝头”。在修路过程中，村里所有男女劳动力，都被调动起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积极参与修筑道路，而且不向村里要一分钱的占地补偿款，不要一分钱的出工费。据史料记载，红军第四次渡赤水后，有一部分红军于1935年3月24日在竹元村驻扎过。竹元村的村民在修路过程中表现出了当年支援红军的政治觉悟。

快马加鞭未下鞍。竹元村继续修通了道路之后，接着通了电，通了水，通了商，通了网，通了财，通了文，通了情，可谓一通百通，事事皆通。到2019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0000元以上，超过脱贫标准的一倍还多。村里不但对800多栋老旧住房进行了升级改造，不少村民还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楼房。以前，竹元村的村民外出不敢说自己是竹元村人，现在他们骄傲地宣称：我是竹元村的！“梧桐树”引来了“金凤凰”，竹元村的小伙子再也不愁找不到老婆。

这天上午，我们来到了竹元村。在公路两边的地里，我们看到了正在挂果儿的核桃树，看到了大片绿汪汪的高粱，还看到了成群散养的牛羊。在村里，我们看到了新建的办公楼、休闲广场和卫生室，还看到了新建的幼儿园、升级改造后的小学校，以及为老师盖的公租房等。看到竹元村的新面貌，联想起自己的贫困经历和我们老家的变化，我心潮起伏，几乎有些眼湿。我想，竹元村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美丽乡村的旅游目的地，能在竹元村住一晚就好了。因日程安排紧张，我们未能在竹元村留宿。留点念想吧，日后，我或许会一个人到竹元村住上一段时间。



成好几个上市企业。之后痴迷于清洁的氢能，从产氢、储氢、加氢到造氢燃料电池，满世界跑，寻找知音，寻找技术的蛛丝马迹，思考系统集成成的办法。“不要相信巧合，没有巧合，所有产生火花的偶然接触都是有准备的头脑安排的，就像咱们今天的会面”“没准备的头脑遇不上新生事物”“只要痴迷，朝思暮想的事早晚都会呈现”。

听到一个八旬老人讲朝思暮想的这一刻，我心生感动。我理解了Matts的安排，我想我找到了像Bofors这样的企业能延续数百年而不朽、能将一个三线城市带入一线行列的原因了。痴迷于自己内心真正热爱的事情，这不仅仅是一种境界，有人是在践行的，在瑞典这样的践行者已有好多代，这样的人我又多了一个。

Kunt现在正投入巨大精力在建设北欧的加氢站系统，给氢能车加氢。他建设的氢站很特别，都是就地找氢，就地制氢，尽量不用集中的电解制氢定式。譬如，他正与瑞典北部的木材加工企业合作用树皮制氢，将氢加给运输原木的大卡车使用。“生物质制氢过程不仅产氢，还产碳纳米管呢，将来若产碳纳米管就能盈利，氢气可免费送人使用。”真希望痴迷的人永葆童真。

## 篱笆

卫建民

朋友去台湾旅游，从网上发来几张照片。我多年走南闯北，对都市里密集高耸、样式趋同的高楼大厦，早已熟视无睹，毫无感觉了。因一组照片上的风景是祖国的宝岛，我感兴趣的是商业街上繁体中文的市招和广告。细细端详那些厚重秀美的颜体、宋体字，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强劲的生命力：一眼可见、谁都认识的汉字在呼唤游客，脚下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又是什么？其中有一张照片，刚入眼帘就令我怦然心动，是朋友站在海边，身后有一圈竹编的篱笆；肥厚、碧绿的亚热带植物缠绕在篱笆底部，一直延伸到碧波荡漾的海岸，远方是海天一线。在台湾海峡，一圈竹编篱笆触动我的心，像蓦然读到一首唐诗绝句，看到一幅宋元时代的山水画。

我的心里，从此装进一圈竖列在台湾海峡的竹篱笆。

北京的北海公园东岸，在“濠濮间”的小山上，有几间古朴的茅亭，还有竹篱笆围住几丛竹子；篱笆依势造型，跟随山坡起伏。顺着石阶蜿蜒而上，闲坐在茅亭下，东南的景山万春亭就成了借景。这是造园者的手笔。偶然回头，透过松枝交错的间隙瞥见北海的碧水，心旷神怡。如果不是竹篱笆而是铁艺护栏，我会视而不见，更不会发生诗意的观感。竹篱笆，从材料的角度说，只是普通的竹竿，但它编织成“空透漏”的竹墙后，就使这一处园林产生山野气息，让游客从闹市走入田园。这就是梁思成先生说的“建筑意”。走过几个城市的公园，我看见，园艺工人都爱以菱形或其它几何形编织成竹篱笆，用这种绿色环保、中国特色的围栏处理公园的空间结构。

近年浏览一些黑白老照片，我发现，在旧时的上海、天津、青岛、哈尔滨，有一些居民区的建筑群，是用竹篱笆间隔；邻里之间，既有区分，又有联系。建筑群的空间处理，不是用砖石水泥高墙分割，家家遮严堵死，而是以隐约、空疏的篱笆，将“墙”的功能和美感相统一。西谚：“邻居可来往，篱笆不能拆。”相当“哲学”地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度。杜甫住在成都时，就有“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诗篇。可见，在唐代成都，篱笆已是“舍南舍北”、邻里之间的分界。如果仅从功能考虑，竹木篱笆能阻挡住什么来自外部的暴力呢？它最多能阻挡猫狗鸡犬的随意乱窜，并没有坚固的防御功能。从“建筑意”来看，住在以篱笆间隔的社区里，居民的心理没有压抑感，整个建筑群的空间是流动、透气的；各家有一小片土地，种花种菜，在都市里就能享受田园之乐。更重要的是，居民有一种安全感、祥和感。

少年时在农村，我见过不少篱笆，也曾和伙伴钻进篱笆偷吃村里人种的西瓜；“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回忆，偏偏是寻常事物藏在深层记忆。我们村的菜园，邻里家的小块地，篱笆是用荆条、杂木、高粱秆编织的。夏秋时节，篱笆上爬满紫色的扁豆花、五颜六色的喇叭花；嗡嗡的蜜蜂，翩翩的蝴蝶，还有一些藤蔓类植物的触须缠绕在上，红红绿绿，随风舞动，像一幅幅色彩明丽的国画。凡是篱笆围起来的菜园，必有一扇荆条或酸枣刺编织的门，在唐诗里，这种门叫“荆扉”“柴门”。今年5月，我在老家，发现有一个本家弟弟，自己编了一扇柴门，以篱笆作围墙，与村里整齐划一、高墙铁门的新住宅形成鲜明对照，我见了欢喜。那些在土地上生长，又与土地相连接的篱笆、柴门，是勾魂摄魄的家园啊。

篱笆，从北中国的农村，到海浪拍岸的海峡；从缠绕紫色的扁豆花，到镶嵌碧绿肥厚的燕子掌，不管它竖立在哪里，都属于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记忆。

我不能忘记，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后，我们县的一个台湾老兵返乡，他刚刚在火车站下车，就用一只脚使劲蹬地，流着眼泪长叹：“终于回家了！”这个老兵从此定居有篱笆的故园，房舍外是一条奔腾的小河。

台湾海峡，有一道竹篱笆。  
海峡两岸，只隔着一道竹篱笆。



## 痴迷

沈志坚（瑞典）

在瑞典中偏南区域，山地的皱褶里分布着众多小城镇。这些城镇不是建在一条河的人河口，就是建在一个大湖湾的开阔地上。

瑞典能源至今水电占很大比重，来源就在于这些湍流。历史回退400年，住在湖口溪流边的聪明人，开始上山采矿。他们将铁矿通过溪流运到湖边，在那儿架高炉，用山上放下来木排烧就的碳炼铁、炼钢，然后用水磨带动铁锤打铁。如此200年，百炼成钢，河口湖边历练出一批百年老店，各自以自家的钢品为贵。瑞典至今为人称道的模具钢、不锈钢、枪炮钢沿着这个轨迹都能追踪到湖口的小城镇。

日前应一位亦师亦友的瑞典同好Matts Andersson之约，重访这样一个小城Karlskoga。现在这个有3万居民的小城以拥有诺贝尔幸存在世的唯一故居为众人所知，每年夏天吸引来大批游客。其实，这儿不是诺贝尔的衣胞之地，他的故乡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即使现在走高速，从斯德哥尔摩开车到Karlskoga也需要花2个多小时。可以想象，一百多年前乘马车到这个山沟里的小城不是件容易的事。成功的实业家诺贝尔自愿从首都奔赴这个小地方，还置地购屋大兴土木，是受那儿出产的好钢所吸引。他是一位投资人，是钢巢引去的凤。1894年当诺贝尔以130万克朗的价格买下那

儿一家钢铁公司Bofors时，Bofors公司已经因出产适合做枪管的好钢而名声在外。诺贝尔将制造枪管的技术与他制造炸药的技术相结合，造就了近代130年来Bofors在全球军需市场的卓越地位。

Matts是我进入牙科领域的引路人，他在Karlskoga出生，他的父亲曾任Bofors公司市场部要职，93岁高龄的老母亲至今仍生活在那里。Matts自己是一名牙科医生，在哥德堡大学牙科学院毕业后到瑞典中部森林深处一个千人小镇当牙医，悠闲自得。上世纪80年代初在那个没有工业基础的小镇，他痴迷上用机器来定制牙冠。受到他父亲及一众Bofors工程师朋友的鼓励与鼎力支持，历10年终于建成全球第一条个性化齿定制生产线。这一开创性的工作为当今全球牙科修复器材大规模数字化定制奠定了基础。Matts退休时他任职的质保公司的新闻编辑让我写几句话，我写了如下一段话：在Matts的发明之前，牙冠都是浇铸成型的，他希望发展一种比浇铸更好的方法。追求更好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操作，而是哲学。

Bofors公司第一次接触牙科是遇上从哥德堡找上门来的Per-Ingvar Brånemark教授，双方合作生产牙科种植体直至今日。1952年Brånemark发现钛金属植入人体后能与骨组织结合到一起，从此痴迷上用钛做

各种各样的牙科种植钉，但苦于找不到能加工钛金属的企业，后经邻居朋友介绍赶到Karlskoga。这才有了全球第一家生产钛质种植牙的工厂，也就是以生产瑞典种植牙著称的诺保科公司的前身。这家由Bofors技术支撑起来的工厂去年还在大力招人扩大产能，种植牙成了Karlskoga的新名片。

记得约20年前第一次访问Karlskoga，就是直奔诺保科的这家种植牙工厂，参加一个项目会议。其后多次到访，都是来去匆匆。这次的再访筹划了足有半年之久，Matts执意要给我引见一位他的朋友，他父亲曾经的同事，一个大忙人Kurt Dahlberg。他对我说：“你一定要见Kunt，你们俩定能碰出火花，从Kunt那儿你会对Karlskoga这个城市，对Bofors这家公司，对瑞典老一辈的创业精神有更深的理解”。

Kunt八十出头，退休已经二十多年，腰板笔挺，现仍痴迷于创新、创业。“看样子我是永远不能退休了。”这是他见面寒暄说的。上世纪70年代他在哥德堡获得机械和电器化两个学位后进入Bofors公司，直至退休一直致力于机电一体化，是40毫米高射炮自动控制体系建设的组织者和重要功臣。在一幢挂着诺贝尔科技园招牌的百年老楼内，Kunt给我们分享了他退休后的创业史。1999年他“军转民”，集成了一套系统，利用冲击能高速成形和剪裁金属，建